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孟晓旭

内容提要: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大国竞争 经济安全战略 战略自主 中美日关系

作者简介: 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31.3; F75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23)01-0033-3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日本对华战略调整及中国的应对研究”(编号:18BGJ056)。

始于2015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博弈,将经济安全作为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面对中美大国竞争,相关各国积极构建经济安全战略,收紧措施,深化合作,强化经济安全能力,甚至还参与“次级竞争”,拓展地缘利益。其中,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特殊且重要。一方面,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在军事安全上依赖美国并坚持采取随美路线,同时与中国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博弈。另一方面,战后以来日本坚持“经济立国”路线,将国家安全与利益置于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与中国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共通的经济全球化愿景。在美国遏制中国“经济优势”并侧重采取经济竞争的背景下，岸田文雄政府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举措可谓大国关系变动下地区主要国家如何因应的典型。

截至目前，学界分别对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战略动向及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这两个独立的课题开展了不少研究^①，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②。实际上，国际环境是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之一。2022 年 12 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最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强调，“维持和强化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和外国共存共荣的国际环境”。^③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面对大国竞争，建议“日本的经济安全必须充分考虑未来国际秩序向日本不愿看到的方向变化的可能性”^④，体现出强烈的国际战略性。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立意应对大国竞争筹划经济安全，并将之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高度。^⑤因此，结合大国竞争背景探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之构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① 有关大国竞争下日本战略动向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杨伯江：《世界大变局：日本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载宋志勇主编：《南开日本研究 202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年；佐桥亮、李冰洁：《中美对峙下的日本战略》，《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 年第 2 期，第 133—143 页；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21 年第 1 期，第 15—20 页；孟晓旭：《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87—102 页；陆伟：《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02—124 页；孟晓旭：《国际变局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东亚评论》第 36 辑，2022 年，第 51—70 页；等等。有关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徐梅：《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22 年第 1 期，第 52—70 页；归泳涛：《经济方略、经济安全政策与美日对华战略新动向》，《日本学刊》2021 年第 6 期，第 45—66 页；颜泽洋：《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4 期，第 26—32 页；等等。

② 日本一些智库基于本国立场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参见：PHP 研究所「ハイテク覇権競争時代の日本の針路—『戦略的不可欠性』を確保し、自由で開かれた一流国を目指す—」、2020 年 4 月、<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402.pdf> [2022-11-05]；村山裕三「日本の技術経済安全保障政策—米中覇権競争の中の『戦略的不可欠性』を求めて—」、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20/10/pdf_policy_20201023.pdf [2022-11-05]。

③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22 年 12 月、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2022-12-08]。

④ 自由民主党務調査会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経済安全保障戦略策定』に向けて（提言）」、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12-06]。

⑤ 「新たな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等の策定に関する有識者との意見交換」、2022 年 9 月 1 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pdf/yousi.pdf> [2022-10-08]。

一、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

美国发动的大国竞争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外交等各领域，旨在维护其国际体系中决定办事方式的“结构性权力”。^① 基于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美国重视经济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并将之作为主要手段，侧重在新兴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产品和产业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相反，为维持与安全关系密切的技术霸权，拜登政府强调联合盟友组建“经济繁荣网络”等，鼓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技术贸易投资“去中国化”，对华开展“包围外交”，批判中国使用所谓“经济胁迫”方式，以期削弱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塑造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技术标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关键，因此为赢取大国竞争，美国要求盟友日本提供战略支持。

（一）大国竞争与经济权力

大国竞争的实质是战略竞争。美国国内形成共识，认为中国等大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明确提出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断衰弱的背景下，大国长期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② 早在1972年，兰德公司战略研究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撰写的报告《与苏联的长期竞争：战略分析框架》在国家安全领域提出“竞争战略”概念，并采用了“净评估”方法，对决定国家实力的相关要素进行比较分析，主张在辨识关键差异下利用优势赢取竞争。^③ “战略竞争”运用“竞争战略”，具有不局限于当下的长期性特点。大国长期战略竞争锁定国际秩序走向，核心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再构建。

在安全战略层面，竞争是指各方尚未达到武装冲突层级的对峙形态。基

^① 苏珊·斯特兰奇指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结构性权力”是指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世界经济的不稳和混乱并不表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丧失“结构性权力”，美国只会改变使用“结构性权力”的方式。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33页。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022-10-20]。

^③ Andrew W. Marshall,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s: 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RAND, 1972.

于经济的非战争性，在评估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影响力的基础上，美国将大国竞争聚焦于经济领域，关注经济安全，谋求经济权力。2017 年，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① 2021 年 3 月，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更为本质上的威胁”，并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明确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的高度。俄乌冲突下，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等措施对俄实施经济打击，但在经济安全上警告和牵制中国的意味更深。2022 年 10 月，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中国“经常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影响各国”，美国将对华开展经济竞争。^②

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及其形成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促使大国竞争重视国家对外经济联系的战略作用。国家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经济联系强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③ 随着经济互联加强和全球化发展，国家卷入彼此事务并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边界之外的事务^④，国家间形成相互关联但不平等的依附关系^⑤，即“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所谓依赖，是指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则指会使各方付出较大代价的相互影响。^⑥ 国家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构成了非均衡的关系格局，并带来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差异和国际经济权力的大小，是国家间建立的一种实力关系，成为大国争取“结构性权力”和其他各国重点关注的经济安全议题。冷战结束后，非对称性的经济依赖关系呈现逐渐替代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更有效的权力手段的迹象。

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构成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的基础，产生了一种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2022-10-20].

②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2-11-20].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6 页。

④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68 页。

⑤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4 页。

⑥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9 页。

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① 基于对外经济联系的脆弱性，各个国家均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并增强他国对本国的依赖性。国家对经济权力的重视和对脆弱性的关注与国际形势及自身状况密切相关，其采取的外部措施或是强化自身对外的经济联系，或是弱化对手的对外经济联系，内部措施则是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能力、加强出口管理以及弱化对手的国内创新能力。此外，国家权力强弱还表现为制定规则并主导其他国家遵守规则的能力。因此，守成国警惕崛起国的对外经济“办事方法”等结构性权力的增长和崛起国在密切的对外经济合作下增强的联系性权力，以及这两种权力交互促动下的国际格局趋向。

基于外部措施的视角，国家在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强大和能够主导国际经济议题的时候，更关注对外经济合作的积极意义，乐于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反之，国家在自身经济相对衰弱和对国际经济议题的主导不断受到挑战时，则更警惕他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上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在国际形势恶化特别是面临秩序变革的时期，守成国甚至倾向于管制对外经济联系以确保实现自身经济安全。其中，对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崛起国持有敌视态度且有经济优势的守成国还会利用经济联系，通过“脱钩断链”恶化崛起国的经济环境，牵制其发展速度，弱化其权力。

基于内部措施的视角，大国竞争聚焦科学技术等现代权力杠杆。经济实力决定国家实力，进而影响国家权力；而经济实力取决于该国技术力量和创新能力。^② 科技通过影响经济或军事领域决定国家实力的大小，并影响权力的发挥。乔治·莫德斯基提出成为世界领导国的四个条件，其一就是该国经济居于国际主导地位，且拥有通过技术革命创造主导产业的能力。^③ 换言之，经济和技术能协助国家塑造和控制竞争，进而形成优势。国际政治的变革历程及其趋向表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更能掌握定义和控制国际秩序的权力。基于国家间竞争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现实，科技实力作为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基础越来越体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大国竞争下的经济安全核心就集中在垄断技术优势上，既防止他国在供应链上“卡脖子”，也限制他国借助外部技术通过创新增强实力，进而提升不对称优势，实现竞胜。

①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0页。

② 日本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刘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③ Modelski G. and Thompson W. R. ,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London: Macmillan, 1988.

（二）经济依赖与经济安全

对外经济联系不仅关涉权力，更与国家安全有密切的关系。密切的经济联系及由此发展出的经济相互依赖能够降低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当年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会减少今后五年内战争爆发的次数。^① 国分良成认为，相互依存对形成国际性的协调关系十分重要，相互依存的增大与深化使双方利害复杂交织，从而使摩擦发展成关系破裂的可能性相对减少。^②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带来共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大国之间、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家彼此之间，会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问题。即，当甲国严重依赖乙国提供某些重要物资时，乙国利用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迫使甲国就冲突做出妥协。其背后的原因是，被他国依赖程度高的国家的国际经济权力比对方更大，能够在某些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③，以及结合自身的经济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甲国会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风险，并试图采取“脱钩断链”等措施。根据安全威胁的程度，甲国会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做出不同的侧重选择。现实主义派观察指出，“如果世界市场经济威胁到国家的生存，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国家生存所必要的一切条件”。^④

面对大国竞争下不确定风险的上升，相互依赖的增加也会使其他国家更为担心失去自主权。一国对国际经济依赖程度越高、根据国际关系变化调整利害关系的能力越低，就越可能将国际经济联系规模的变化视为威胁。^⑤ 面对大国竞争，其他国家为扩大经济利益和确保经济安全，既强化有益的对外经济联系，也避免可能形成损失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与守成国关系密切且与崛起国有地缘竞争和安全矛盾的国家，还会利用大国竞争及国际形势变化经营外部经济环境，拓展国家战略利益。

对于如何衡量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程度，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

^① Edward D. Mansfield, "Concentration, Pola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Iss. 1, March 1993, pp. 105-28.

^② 国分良成：《“1972 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日本学刊》1997 年第 5 期，第 49 页。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11 页。

^④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207 页。

^⑤ 山本吉宣·薬師寺泰藏·山影進『国際関係理論の新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 年、135—157 頁。

提出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指标。敏感性指标测量行为体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行为体，衡量标准是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脆弱性指标测量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衡量标准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① 理查德·库珀认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冲突主要源于跨国交易对国内外发展状况的敏感性，而非跨国交易的绝对数额或者相对数额的大小。^② 张蕴岭提出，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贸易量都不能反映国际贸易所导致的代价效应，它们最多体现了两国之间的联系，而敏感性和脆弱性更能反映出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③

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侧重方式各不相同，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将经济作为实现安全的手段，也就是“经济方略”。除采取压力改变对方行动外，还包括输出经济利益（如援助、技术合作）和构筑良好关系（如同盟、从属关系）等，战略目的也不限于经济利益，还包括遏制战争、争取或维持盟国、削弱或加强他国同盟等政治外交目标。战略方式有：“发信号”，即向对方传达友好、反对等重要信息；“封锁”，即通过经济制裁使对方弱化；“强制”，即制造经济损失使对方向其希望的方向转变；“收买”，即通过交换经济利益推动对方向其理想方向转变；“诱导”，即改变对方国内利益结构进而改变其国家利益定义、引导对方迎合等。第二类是强化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为应对威胁采取脱离市场规则的政策，具体包括实施保护关税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等保护主义。战略方式有：“抵消”，即消除经济负面影响；“提取”，即筹措对安全重要的财富和资源；“强化”，即增强产业竞争力等来维持和强化本国和盟国力量等。第三类是强化国际经济体系，维持相互依存。即通过国际合作构建危机管理体制，及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维持和主导国际秩序。^④

（三）美国对日本战略要求

为深化中美大国竞争，拜登政府提出“综合威慑”概念，强调联合盟友及伙伴，在各领域利用经济、技术和外交手段形成力量优势，对制衡对象实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2页。

^② Richard N.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③ 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西欧研究》1988年第4期，第1—10页。

^④ 中村直贵「経済安全保障—概念の再定義と一貫した政策体系の構築に向けて—」、『立法と調査』第428号、2020年10月、126—130頁。

现有效威慑。具体到经济安全领域的措施，包括与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密切的经济合作，联合防止中国增强实力。^① 美国认为与盟友在经济领域的“集体资源”可以超越中国“规模优势”，并在“印太战略”下将“印太”作为主战场。

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强调“整合协调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对华竞争手段和方法”，表示要改变之前美国在“狭隘视角”下做出的亚洲“只是地缘政治竞争棋盘”的判断，主张“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抵制‘经济胁迫’”。^②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的优先事项就是集中资源在“印太”形成有影响力的联盟。^③ 大国竞争下，美国将中国渲染为秩序的“破坏者”，强调“防止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扰乱全球市场并损害美国的竞争力”，并致力于与盟友及伙伴建立一个国际共识，即“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正在破坏全球贸易体系”。^④

大国竞争下，美国以经济为抓手，要求盟友把重点放在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日本是美国推进地区经济政策的关键，拥有中美都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而且战后长期在亚太区域深耕经济合作，在地区经济合作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多次就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向日本施压。2022 年 9 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日本半导体相关企业高管座谈，呼吁日本加大对美投资，建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12 月 9 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举行会谈，要求日本作为共享对华战略的同盟国响应其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

此外，为回应日本要求美国强化在区域的战略性存在，拜登政府进一步接受并深化日本倡导的“印太战略”，加大对“印太”的经济参与，绕过国会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强调“加倍强化与‘印太’经济联系的同时，为广泛收获‘印太’地区的增量机遇做好准备”。^⑤ 其目的是填补特朗普

① *Indo -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2 - 11 - 20].

② 同上。

③ *Biden - 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2 - 11 - 20].

④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 - Pacific”, <https://sgp.fas.org/news/2021/01/indopac-framework.pdf> [2022 - 11 - 20].

⑤ *Indo -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2 - 11 - 20].

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造成的空白,力争在供应链、重要技术等领域与日本等盟友及伙伴共建规则,获取大国竞争优势。“印太经济框架”涵盖的四个支柱恰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经济领域内提出的优先事项。在美国的战略要求下,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针对中国指向。

二、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战略认知

相较其他国家,日本较早地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视野。作为“经济立国”的“非正常”国家,日本偏好“将经济等更广阔领域的目标作为高度重要的国家目标”,并“最大限度地充分运用非军事手段”。^① 20世纪70年代,大平正芳政府就倡导“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通过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等。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下外部风险的增大,特别是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导致日本经济安全意识高涨。大国竞争进一步刺激和加速了日本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进程。^② 2022年5月,岸田明确表示,提高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等经济安全举措是日本应对动荡世界的基本思路。^③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日本密切关注大国竞争并积极思考战略出路。

(一) 日本对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

日本提出,经济安全具有手法多样、影响因素复杂和战略目标多元的特点,具有“自身”和“对方”以及“防”和“攻”的“二元并立”,在维护安全的同时兼具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战略抱负。野林健等人认为,经济安全是在强化本国竞争力的同时削减他国竞争力。^④ 明石道融和小久保祐辉认为,经济安全是指采取经济措施,保护国家层面的安全不受外部经济手段的威胁。^⑤ 川口贵久等认为,经济安全是通过经济的手段实现政治目

① 衛藤藩吉・山本吉宣『総合安保と未来の選択』、講談社、1991年、556頁。

② 川口貴久「経済安全保障推進法案の概要と今後の争点」、<https://www.tokio-dr.jp/publication/report/riskmanagement/pdf/pdf-riskmanagement-367.pdf> [2022-12-05]。

③ 「第27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さん会 岸田総理スピーチ」、2022年5月26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526speech.html [2022-12-10]。

④ 野林健・大芝亮・納家真嗣・山田敦・長尾悟『国際政治経済学・入門 第3版』、有斐閣、2007年、103頁。

⑤ 明石道融・小久保祐輝「外交・安全保障 第2回 経済安全保障推進法の成立と今後の注目ポイント」、<https://www.mri.co.jp/knowledge/column/20220617.html> [2022-11-15]。

标，确保安全。^① 自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的政策报告认为，要“从经济层面确保日本的独立、生存以及繁荣”，经济安全战略应是“从经济方面确保《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定义的国家利益”的战略，并将“战略自律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视为经济安全的核心要素。^② 该份由执政党提出的报告成为日本政府推进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引。

日本关注经济安全的国际安全属性，认为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强，经济安全就越重要，并提出应该根据国际环境和技术的变化，将“安全”与“经济”结合起来，在国际社会和大国竞争中行使有影响力的外交。日本安全保障类教科书《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认为，经济安全应同时确保经济自主和国际竞争力，途径是一国必须克服经济脆弱性，维持或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③ 国分俊史提出，中美竞争是以不使用军事对抗为大前提的，是通过经济相互碰撞的“使用经济的战争”，因此就有了经济安全问题。^④ 实际上，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萌发期就将国际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重视。1980 年，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在“综合安全保障”报告中就“经济安全”提出的目标之一是维持和运营相互依存的体系，包括维持自由贸易体制，以及作为中间方案的与经济上重要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⑤

在全球化时代，日本进一步注意到经济与安全在国际层面的复杂互动联系，并提出两种维护经济安全的路径：（1）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2）管理对外经济联系，免受威胁。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管理等，强化安全的国内经济环境，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安全环境，在对外经济联系中降低安全威胁和减少利益损失，同时主张应对“他国经济威压动向”。^⑥ 在管理对外经济联系上，日本攻防兼备，强调应尽量迟滞

① 川口貴久・柴田慎士「経済安全保障を考慮したガバナンス・リスクマネジメント態勢の構築」、『リスクマネジメント最前線』第 6 号、2021 年、2 頁。

② 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12-06]。

③ 日本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第 196—197 页。

④ 「新たな『防衛力』経済安全保障とは何か」、2020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46667.html> [2022-10-20]。

⑤ 「大平総理の政策研究会報告書 5 総合安全保障戦略」、1980 年 7 月 2 日、https://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JPSC/19800702_01J.html [2022-10-20]。

⑥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22 年 12 月、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2022-12-08]。

重要技术转移至可能在国际安全领域成为威胁的国家，并研发各类新技术。^①

（二）日本对形势的战略认知

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亦称《外交蓝皮书（2022）》）提出，当前国际秩序及基本价值面临严峻挑战，世界进入以中美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时代。^② 2022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将急剧增强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明确定位为安全上的重要课题，提出“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在国际上呈扩大化趋势”。^③ 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东亚战略概观2022》提出，“随着美国与中、俄对立的加剧，大国竞争时代已到来”，大国竞争包括围绕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围绕地缘政治开展的战略竞争。^④

日本警惕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下的国际安全趋势，认为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安全挑战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存在将经济手段作为追求本国利益的“武器”加以运用的情况。日本经济同友会提出，在国际既有秩序出现动摇的情况下，经济领域成为国家间对峙的最前线，在国家安全仅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的当下，大国竞争更侧重使用经济手段，出现通过经济手段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以利于本国的活动。^⑤ 日本自民党提出：“经济依存关系复杂化，有将其用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动向，产生了国际经济可能被分割的新状况。”^⑥ 《外交蓝皮书（2022）》提出，国家安全已从单纯军事领域扩大到经济技术领域，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以及量子技术等重要新兴技术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经济依存关系有可能在国家间交涉中被利用。^⑦

在复杂且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变革期，日本认为大国竞争将会长期持续，

① 通商産業省産業構造審議会編『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を目指して』、1982年、14頁。

② 外務省『令和4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 [2022-10-20]。

③ 防衛省『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2/pdf/R04000031.pdf> [2022-10-20]。

④ 高橋杉雄「日本一大国間競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政治的選択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22』、<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pdf/eastasian2022/j08.pdf> [2022-10-20]。

⑤ 公益社団法人経済同友会「強靱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に向けて—地経学の時代に日本が取るべき針路とは—」、2021年4月21日、<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 [2022-12-06]。

⑥ 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年12月16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12-06]。

⑦ 外務省『令和4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 [2022-10-20]。

因为对华“脱钩”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中长期战略，中国也提出在军事、经济、产业等所有领域抗衡美国的中长期战略，中美对立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变化。^① 伴随中美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博弈，日本更趋深刻地思考经济和外交、安全的密切关系，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密不可分，并在“地缘政治学”之外提出“地缘经济学”和“地缘科技学”等概念，认为在大国竞争下，美国早已转变了“对华接触”政策，基于民主主义和价值观开展对华政策，在经济活动中加入了安全因素。^②

面对聚焦经济安全的大国竞争，日本开始警惕具有经济优势的中美“频繁”使用“经济制裁”，甚至担心在国际经济领域被中美排除在外，所以同时关注中国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和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及美国出台《国防授权法案》等经济安全举措。时任自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主席的甘利明就曾表示：“特朗普政府出于利己外交频繁使用经济制裁，中国也在增加与对方国家贸易额的基础上将经济制裁作为施压手段来使用”，日本“如处理不当，别说企业，甚至整个国家都有可能被排除在中美双方的供给网之外”，“必须提升本国自律性和强韧性”。^③

（三）日本在应对上的战略思考

日本密切关注与澳大利亚、印度及欧洲国家应对大国竞争的经济安全举措，支持扩大“自由公正”的贸易圈，肯定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经济安全合作。岸田表示：“世界主要国家都大力推进措施，强化支援半导体等产业的基础，防止外国研究人员参与的精微技术外流，强化应对网络攻击，加强出口管理。”^④ 《外交蓝皮书（2022）》强调：“各国为确保‘战略自律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正考虑维持和扩大自由、公正的经济圈，与现有国际法整合等，并在经济安全上进行努力。面向供应链的强韧化，也看到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扩大合作的动向。”^⑤ 为在大国竞争下实现国家安全，日本认为必须

① 川口貴久「経済安全保障推進法案の概要と今後の争点」、<https://www.tokio-dr.jp/publication/report/riskmanagement/pdf/pdf-riskmanagement-367.pdf> [2022-12-05]。

② 公益社団法人経済同友会「強靱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に向けて—地経学の時代に日本が取るべき針路とは—」、2021年4月21日、<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 [2022-12-06]。

③ 「（経済安保 米中のはざままで）経済安保、揺さぶられる日本 米中との結びつき、失う恐れ」、『朝日新聞』2021年3月28日。

④ 「防衛・経済安全保障シンポジウム」、2021年12月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actions/202112/03boueikeizai.html [2022-10-20]。

⑤ 外務省『令和4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 [2022-10-20]。

综合且迅速地制定经济安全战略，提出“需要以更高阶的战略构思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有必要就如何从经济方面确保日本独立、生存和繁荣确立明确的战略”，“采取具体措施”。^①

其中，基于对大国竞争关系着国际秩序未来走向和价值取向的判断，日本突出强调“中国挑战”，将中国视为对手和主要影响因素，提出“由于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和军事现代化，‘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成了重要的战略课题”。^② 2022年，日本国际论坛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建议：日美应对中国战略的基本原则》提出，日美必须摒弃经济和国家安全是两个不相关领域的观念，应意识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要求认真评估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长期影响。^③

具体而言，日本认为中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可能带来的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国外先进技术与信息数据转为军用，生产的无人机、监控摄像头等存在安全风险，可能导致使用经济工具的新型“战争”出现；二是利用经济优势对外施加影响，包括控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等；三是借助经济崛起输出政治模式，威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恶化“印太”环境。日本还认为，在西方技术优势不再的情况下，来自中国技术发展趋势的安全影响凸显，甚至出现了与“民主价值观”相反的所谓“数字专制主义”动向。自民党内支持经济安全呼声高涨的背景就是中国崛起的经济技术优势与地缘政治关联。^④

综上，面对大国竞争的加剧，一方面，日本感到为难，“日美共享价值观，长期形成可靠的同盟关系。同时，日本扩大和深化了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中关系在历史、地缘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与美中关系有很大不同。在一些产业领域，日本的竞争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在这样复杂的前提下，日本有必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突围”。^⑤ 另一方面，日本也观察

① 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经济安全保障战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年12月16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12-06]。

② 高橋杉雄「日本—大國間競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政治的選択—」、『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22』、<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pdf/eastasian2022/j08.pdf> [2022-10-20]。

③ 「日米の対中戦略の基本原則」、https://www.jfir.or.jp/wp/wp-content/uploads/2022/09/220901_prj.pdf [2022-11-15]。

④ 宮本雄二・伊集院敦・日本経済研究センター編著『技術覇権 米中激突の深層』、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20年。

⑤ 白石重明「『经济安全保障』の本質的課題」、2022年3月8日、https://www.npi.or.jp/research/data/NPI_RN_20220308_shiraishi.pdf [2022-11-15]。

到，同样作为“中等强国”的欧洲国家，即使与美国关系停滞不前，也在经济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在安全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提高战略自主性。基于日本主导高度自由化且倡导高质量和规则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个“筹码”，日本经济团体提出“不能被动地应对中美欧动向和要求，必须自己选择，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和地区相互协调和竞争，积极参与规则的形成”，强化由经济力、技术力、防卫力构成的综合国力。^①

三、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路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在相当长时期未集中讨论过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在日本扎根程度以及政策体现并不明确”^②。2018 年前后，日本加速推进经济安全政策。2020 年以来，日本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在出口管理和外资管制领域采取相应经济安全举措。^③ 岸田上台执政后，进一步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2021 年 10 月，岸田在首次施政演说中强调“果断推进经济安全等新时代课题”，表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就是经济安全。^④ 2021 年 11 月，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提出了经济安全战略“三大支柱”，包括：通过确保供应链的强韧和基础设施的可靠，提高“自律性”；致力于培养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确保日本技术的优势，强化“不可或缺性”；维持和强化基于基本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⑤ 总体来看，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是一个综合型攻防兼备的竞争性战略体系。

① 公益社団法人経済同友会「強靱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に向けて一地経学の時代に日本が取るべき針路とは一」、2021 年 4 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2022-12-06]。

② 中村直貴「経済安全保障一概念の再定義と一貫した政策体系の構築に向けて一」、『立法と調査』第 428 号、2020 年 10 月。

③ 村山裕三「日本の技術経済安全保障政策一米中覇権競争の中の『戦略的不可欠性』を求めて一」、2020 年 10 月、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20/10/pdf_policy_20201023.pdf[2022-10-20]。

④ 「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1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2022-11-15]。

⑤ 白石重明「『経済安全保障』の本質的課題」、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www.npi.or.jp/research/data/NPI_RN_20220308_shiraishi.pdf[2022-11-15]。

（一）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追求“战略稳定性”和“战略综合性”

日本将经济安全保障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通过统筹顶层设计，推动战略体系化。2021年12月，岸田在第一届防卫和经济安全研讨会上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动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表示会在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中明确写入“经济安全”相关内容。^①经济安全也被纳入日本政府在各领域的战略设计中，如《海洋基本计划》中就写明要强化经济安全，把海洋资源开发等列为经济安全重要课题之一。日本还拟在即将修订的《开发合作大纲》中加入重视重要矿物资源稳定供应等经济安全内容。

在机制建设和统筹监管上，日本在政府内构筑跨部门协调与合作机制，提高信息掌控能力，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管理。2020年4月，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局内新设“经济班”，对各省厅经济事务实施一元化管理，统筹制定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涉及经济安全的政策与规划。“经济班”具有跨部门的综合性，成员来自经济产业省、财务省、外务省、总务省及警察厅等各省厅，就其规模而言，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中仅次于核心部门“综合组”，体现了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应对。

其他主要省厅也相继成立经济安全综合部门，统筹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强化对经济活动的监管。2019年6月，经产省设置“经济安全保障室”，负责讨论经济安全并制定政策。10月，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安全保障政策课新设“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负责外交政策中的经济安全课题。2021年4月，防卫省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负责搜集和分析关涉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3D打印等可能转化为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信息。12月，内阁府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室”。2022年4月，公安调查厅设置“经济安全保障特别调查室”。同年，警察厅和金融厅也分别设立了“经济安全保障对策室”。

在制度保障上，日本政府强化经济投资审查制度，建立土地使用调查制度，完善经济安全法制建设。2018年12月，日本首次制定有关中央省厅和自卫队使用的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规定严格遵守采购标准和认证制度。2020年5月，日本修订版《外汇法》开始实施，加强管控对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外资。2021年6月，日本出台《土地利用限制法》，限制利用与交易对安全重要的土地。2022年4月和5月，岸田政府力推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① 「防衛・経済安全保障シンポジウム」、2021年12月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actions/202112/03boueikeizai.html [2022-10-20]。

案”分别获众参两院批准，成为日本首份专门性经济安全法律。

日本还将经济安全政策与企业活动及国民财产关联，加强“产官学”合作，扩大投资并采取措施，加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指导与管理，强化经济安全的社会基础，努力构建完善的技术安全体系。日本严格管制军民两用技术，加强对相关企业的核验工作，限制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信息的公开，对关系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在官民技术合作方面，打造由官民共同参加的磋商框架，投入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基金”，支持政府系智库调查海外动向并提供信息，加强“产官学”信息共享和加快研发。日本政府还指导企业成立负责经济安全的管理架构。2020 年，三菱电机新设“经济安全保障统括室”，由前经产省干部出任主管董事。2021 年，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加盟企业为中心，成立了新组织“国际经济外交综合战略中心”。2022 年 4 月，日本电气新设负责经济安全的董事，并成立“经济安全保障室”。日本警察厅及各地警局也向企业及大学提供“经济安全保障咨询”，避免尖端技术外流。

（二）紧抓重点领域，采取针对性举措，强化“战略自律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

关于经济安全的战略重点，自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的政策建议报告就 16 个重点领域提出了应解决的课题及其对策等，并从加强体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给出建议，强化“战略自律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战略自律性”强调内部安全能力建设，确保不过度依赖他国；“战略不可或缺性”则注重提升国际战略地位，强化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产业，掌握价值链和供应链要害，确保“长期的”“可持续”繁荣。^① 2021 年 10 月，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在日美同盟专家会议“富士山对话”上就此表示，“自律”意味着认识并修正自身瓶颈，“不可或缺”意味着确保掌握其他国家的瓶颈。

据此，日本紧盯关涉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2022 年 1 月，岸田就经济安全强调将“支援半导体制造工厂的设备投资，以及政府和民间面向 AI、量子、生物、生命科学、光通信、太空、海洋等领域的研发投资”。^② 经济安全涉及

^① 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经济安全保障战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12-06]。

^②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2022-11-15]。

领域广泛，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则主要集中在强化供应链稳定、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促进开发尖端技术和保护敏感技术专利等领域，这也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关注的核心，即紧紧围绕“战略自律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点目标。

在确保重要物资供应链稳定上，日本政府指定“特定重要物资”，制定民间事业者认定供给确保计划，采用财政支援或优惠贷款方式鼓励企业稳定供应。所谓重要物资，是指满足“若供应中断会对国民生存造成直接影响”及“供应来源偏向少数特定国家”等条件的物资，特别是半导体、芯片等。2021年5月，甘利明表示：“控制半导体也就控制世界之说不过分。”安倍则表示：“半导体可能成为所有产业的关键点”，“从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国家战略的政策”。^①2021年12月，日本通过了包括为新建半导体工厂提供支持等内容的法案。在2022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案中，日本政府决定对构建半导体供应链提供资金支持，总规模达1.3万亿日元左右，具体包括为日美联合推进的新一代研究中心建设提供约3500亿日元，为尖端产品生产基地提供约4500亿日元，为确保制造半导体必不可少的零件材料提供3700亿日元。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基于《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把半导体、蓄电池、重要矿物等11个领域的物资指定为确保稳定获取的“特定重要物资”。

在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上，日本政府重点加强稳定性方面的审查，确保国内企业不会使用可能产生风险的设备，并指定了14个领域的特定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石油、电力等。日本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企业实施事前审查，要求报告安装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的计划以及供应商，重点调查电力、通信等重要设备和系统是否使用了会对安全造成威胁的外国产品，确认业务委托方是否合适，并根据情况发出劝告和命令。

日本政府还对涉及安全的“特定重要技术”加大资金投入、政策倾斜和信息支持，致力于主导前沿技术的研发。日本认识到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高科技竞争，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出：“防止尖端技术流出和强化出口管理，推进供应链强韧化和科学技术创新成为激烈的国家间竞争的核心。”^②日本认为，尽管全球化快速推进，但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安全自助的基础仍是

^① 「自民の半導体議連が発足」、『朝日新聞』2021年5月22日。

^② 防衛省『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2/pdf/R04000031.pdf> [2022-10-20]。

各国的实力，科学技术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2022 年 10 月 3 日，岸田表示：“日本将致力于顺利实施《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提升在太空、海洋和网络等领域的关键技术。”^② 9 月 29 日，日本政府公布“特定重要技术”的“第一次研发愿景”，将无人侦察机等 27 项重点技术指定为援助对象，由国家提供资金进行研发，并且规定这些“特定重要技术”的研究成果，若在国外转用于军事等用途则不予公开，对关系国家安全及国民安全的发明则授予非公开专利权。为防止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外泄，日本还对涉及武器开发等精微技术的专利申请进行是否公开的事前审查，对外强化不公开专利申请的信息保护措施。

（三）基于价值观加强对外经济安全合作，谋求“战略塑造性”和“战略主导性”

日本面临的经济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这与日本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环境有关。除加强内部战略应对外，加强对外经济安全合作是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③ 同时，在对外合作中形成并主导国际经济安全规则也是强化“决定办事方式”的“结构性权力”，对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塑造和主导作用。岸田就经济安全表示，“仅靠日本一国难以实现相关对策”，“开展国际合作必不可少”。^④ 他还强调，日本要“以维持和强化基于基本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目标”。^⑤ 日本将对外经济安全合作作为制定国际规则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路径，强调“只有拥有根据国际规则建立秩序的力量才是实现经济安全的最有效手段”。^⑥ 日本强调由己主导，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强化战略合作^⑦，确保自律性并获得优越

① 日本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第 94 页。

② 「第二百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2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1003shoshinhyomei.html [2022-11-15]。

③ 細谷雄一「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に多層的視点が欠かせない 一 国家安全保障の中核としての国際戦略を推進せよ」、2021 年 11 月 29 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70935> [2022-11-07]。

④ 「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ーグ（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調講演」、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2022-11-15]。

⑤ 「防衛・経済安全保障シンポジウム」、2021 年 12 月 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actions/202112/03boueikeizai.html [2022-10-20]。

⑥ 鈴木一人「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絶対押さえておきたい論点—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と目的は同じでも手段は異なる—」、2021 年 11 月 22 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69953?page=4> [2022-10-25]。

⑦ 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12-06]。

性^①。这种“战略优越性”的目标就是实现战略塑造和战略主导。在对外经济安全合作上，日本以日美双边为“核心伙伴关系”，以日美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多边框架为重心，在“印太战略”下开展扩大型的多层战略安全合作。

首先，在日美双边层面，加强日美经济安全合作有助于强化大国竞争下的同盟关系，如将合作只限定在防卫领域而忽视尖端技术等领域，两国的国际优势可能会消失。^② 日美经济安全合作主要集中在关键供应链和重要技术领域，特别是谋求主导国际经济安全秩序。2021年4月，日美举行首脑会谈并发布联合声明《新时代的日美全球伙伴关系》，商定在“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下合作构建半导体供应链。5月，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半导体联盟，谋求参与制定半导体领域规则。11月，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经产大臣萩生田光一与访日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会谈，就设立局长级磋商机制“日美贸易合作框架”达成一致，主张“建立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意在主导“印太”经济规则。2022年3月，“日美贸易合作框架”首次会议围绕“印太”贸易合作以及第三国贸易惯例、数字技术等交换意见。6月，日美创设“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保障稀土等重要矿物资源稳定供应，改变供应链依赖，降低经济安全风险。7月29日，日美举行首次经济版“2+2”部长级磋商，以经济安全为焦点，合作强化供应链和出口管制，协商共同研究新一代半导体，并就应对不公平贸易惯例与“经济威压”交换意见。8月25日，“日美贸易合作框架”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数字经济安全合作，并就“应对第三国扭曲贸易的做法进行磋商”。

其次，在多边框架层面，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将QUAD作为开展大国竞争的主要多边平台。为借用美国的推力，日本将经济安全合作的重点也置于QUAD框架下，以谋求集体性力量。2022年5月，QUAD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四国清楚自身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能力和弱项，将进一步利用互补优势实现多样化和竞争性的半导体市场”，并发布《关键技术供应链原则共同声明》，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关键供应链安全提供合作基础。^③ QUAD峰会联

① 「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 2021 について」、2021 年 6 月 18 日、https://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cabinet/2021/2021_basicpolicies_ja.pdf [2022-12-06]。

② 細谷雄一「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に多層的視点が欠かせない訳—国家安全保障の中核としての国際戦略を推進せよ—」、2021 年 11 月 29 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70935> [2022-11-07]。

③ 外務省「重要技術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に関する原則の共通声明」、2022 年 5 月 2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897.pdf> [2022-11-15]。

合声明的要点有：（1）确认积极致力于打造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安全供应链；（2）建立新的基础设施合作关系；（3）开启网络安全合作，协作保护重要基础设施。此外，日本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就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展开合作，在关键领域加速对华“脱钩”。在三边层面，2021 年 4 月，日澳印达成《供应链弹性倡议》，同意就三国相互提供资源、技术的供应链展开合作；2021 年 12 月，美日澳就基础设施和重要矿物合作达成协议。^①

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同盟体系内的“北锚”和“南锚”，因应美国发动的大国竞争积极开展经济安全合作。2020 年 11 月，日澳首脑会谈确认经济安全日益重要，同意在信息通信和重要矿物资源等领域加强安全合作，就电子商务规则制定和推进包括氢在内的能源安全合作达成一致，强调两国共同繁荣取决于安全可靠的供应链，表示要在太空、网络、数字、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和海底电缆）以及资源安全（包括建立开放、安全、弹性和高效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加强合作。两国强调要提高“印太”供应链的复原力和效率以促进贸易和投资，承诺扩大自由、公平、包容和基于规则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通过 CPTPP 等方式保持地区内外的市场开放，申明贸易绝不应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同意密切合作以确保以市场为导向的条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非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环境。^② 2022 年 1 月，日澳首脑会谈再次就经济安全合作达成一致，同意加强合作以应对非法技术转移、构筑弹性供应链、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并承诺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发，商定在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上加强合作。^③ 7 月，日澳设立局长级“日澳电信强韧化政策对话”机制，加强通信强韧性和安全性。10 月，日澳经济部长对话通过的联合声明强调，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开展合作以应对“经济威压”，并确认强化供应链的重要性。

再次，在扩大战略合作层面，日本进一步强化利用经济手段对东南亚国家开展战略性支援，打造多层次稳定供应链，通过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推动经济“高规则”落地。日本政府专门划拨 2435 亿日元资金，鼓励驻外企业将

① 外務省「日米豪 3 国協力（インフラ、重要鉱物）に関する協議」、2021 年 12 月 1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page25_002069.html [2022 - 11 - 15]。

② 外務省「日豪首脳会談」、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au/page3_002927.html [2022 - 11 - 15]。

③ “Australia - Japan Lead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January 6, 2022,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83824.pdf> [2022 - 11 - 15]。

其生产线搬迁至东南亚等地。2021年11月，日越举行首脑会谈，确认强化供应链合作，商定在生产基地多元化、培育中下游产业和改善日企投资环境等方面进行合作，同时还确认了维持CPTPP高规则的重要性。2022年5月，日越首脑会谈又同意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日本表示将推进技术转让，以使越南更深入参与区域和全球供应链。同月，日欧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反对“经济威压”，同意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上开展合作。^①9月，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确认推进合作强化供应链，建立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企业共享物资库存等数据的机制。岸田表示，日本将在2022年以后的五年时间内，在东盟为至少100个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项目提供支援，并推进数据跨国共享、合作的通用规则等以提升供应链韧性。^②11月，日美韩首脑会谈同意新设三国经济安全对话机制，强调合作促进技术主导，确保供应链安全，促进关键和新兴技术，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反对“经济威压”等。^③

四、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不足

基于日美同盟和国际国家身份，战后日本经济安全政策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冷战背景下，日本就曾追随美国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1987年“东芝事件”爆发后，日本加入美国“战略防御计划”。1988年4月，日本外务省专设“经济安全保障室”，负责调查东西方经济关系动向。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维持作为“西方经济一员”地位和改善战后国际环境的同时，在经济领域防范和针对中国的目标始终存在，在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努力维持技术优势，针对对华出口中涉及军事用途的货物、技术等敏感物品更是采取“全管制”措施，担心产生“回旋镖效应”。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和大国竞争加剧的复杂背景下，经济安全战略构建是岸田政府的主要战略议程，日本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两重奏”背后透露了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自主性，其中夹杂的浓

① 外務省「第28回日EU定期首脳協議共同声明」、2022年5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3314.pdf>[2022-11-15]。

② 「第27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さん会 岸田総理スピーチ」、2022年5月26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526speech.html[2022-12-10]。

③ 外務省「インド太平洋における三か国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プランペン声明」、2022年11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20130.pdf>[2022-11-15]。

厚的政治外交战略意图难免使其具有一定的不足。

（一）“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的战略自主摸索

日本担心大国竞争下自身的经济安全、发展环境乃至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和经济优势、减少与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相关的风险，加上与中国有复杂地缘竞争与安全矛盾，日本立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基于价值观选择了与盟国美国接近的经济安全战略构建路线，而新冠疫情助推了这一进程。在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下，美国担忧若放任中国特别是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利己的安全平衡和国际秩序恐将被打破，因此要求日本给予战略配合。美国聚焦数字贸易规则、半导体等战略物资供应链以及精微技术出口等关键领域，在国际经济安全联盟中主张构筑对华包围圈。在这个联盟中，日本处于美国的领导之下，美日打造的“具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由美国定义和主导。2021 年 9 月，美国商务部以提升半导体供应链透明度为名，直接要求日本企业在内的全球重要芯片企业提供商业数据等敏感信息，并以《国防生产法》等政策工具为后盾，迫使它们遵照美国的要求采取行动。美国重视日本对华经济影响力和地缘政治便利，要求并紧盯日本在大国竞争中发挥制华“力量倍增器”作用。在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美国加大对岸田政府的“控制”，包括在总统、国务卿、驻日使馆等各层面强化对有“宏池会”背景的岸田政府的“战略督导”，要求日本强化执行拜登政府重视的作为大国竞争主要手段的“印太战略”。

维护国家安全经常是政治领导人借以获取政策支持的一个口号。^① 确保经济安全也被日本政府运用为获得国内政策支持的口号，其实际目标是借助大国竞争再次融入欧美经济圈，在关键领域战略性对华实施局部“经济脱钩”。按照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逻辑，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实行的是“更聪明的全球化”。作为奉行开放的自由贸易的国家，日本反对“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其经济安全战略管制面的目标虽有与中国部分“脱钩断链”的一面，但更宏大的战略性目标则是与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对接，应对大国长期竞争带来的“经济挑战”，重塑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和安全秩序。日本积极将经济安全合作内容添置于日美同盟的框架中，赋予同盟新的任务，即进行新一轮的对外“经济安排”重置。

在经济安全领域，美欧协作密切，并设立了部长级会谈机制。2021 年 6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6 页。

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磋商机制成立，在出口管制、应对强制技术转移和稳定供应链等经济安全领域强化合作。2022年5月，美欧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双方商定建立预测和解决潜在半导体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预警系统，以及建立跨大西洋半导体投资方法等。日本为使本国产品继续被西方市场认可和接受，就必须像美欧一样并与它们一起商讨构建经济安全机制。这样的观点在日本国内受到普遍认可，其背后是大国竞争下日本与美欧在国际安全战略上的整体接近。日美新设经济版“2+2”对话机制及其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也表明，日本开展国际经济安全合作的战略重点和价值方向仍是美西方。尽管美国没有重返TPP的足够热情和动力，但日本坚持认为美国不是“不重返”，岸田及日本官员依然在对美各级会谈中呼吁美国“尽早回归”。日本支持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其背后的战略判断就是美国国内以美国主导多边贸易秩序构想的呼声开始高涨，同时也没有对亚太地区的贸易秩序失去兴趣。

日本认可与欧美在经济安全上的对接，认为这是“基于规则”且有未来前景的举措，提出与欧美就制裁人权问题、严格投资管理、保护不受外国政府影响的技术人员交流和对精微技术的保护等建立对等的体制很重要。^①这既是日本在大国竞争形势下基于地缘战略动态采取经济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体现，也是日本奉行的“民主价值观”发挥作用的体现。日本坚持民主、人权等“经济安全价值观”，认同“印太经济框架”宣传的“公平经济”，表明其经济安全战略还是以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圈为首要，目的就是与欧美经济实现战略对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令日本失落并担心会丧失区域经济主导权。大国竞争下面临的“选边假想”和俄乌冲突下对地缘前景的担忧，导致日本对长期以来中日在经济合作上形成的“量”的“不对称”经济联系都很警惕与不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肆渲染中日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超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却刻意忽视和不谈经济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指标及其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呈现的状况，目的就是为自己脱离出战后以来与中国形成的“经济密切关系”造势，诱导国内民众支持政府政策。日本重置经济联系圈背后的宏大战略意图是，要在地区

^① 「（経済安保 米中のはざまで）日本はどう活路を見いだすか 甘利明氏、佐々木伸彦氏、佐橋亮氏」、『朝日新聞』2021年4月4日。

层面成为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不受中国制约、可以在对华关系上不那么顾及经济因素的“独立大国”。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过程表明，日本正在尝试走出“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二元依附”状态，对照欧洲国家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摸索战略自主。共和党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民主党拜登政府面对俄乌冲突的“不出兵”，加深了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可信度的怀疑；而中国经济崛起及对外经济合作下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反推日本逆转之前“强化对华经济联系”的政策，从战后初期主动的“以经促政”变为当前被动的“防经胁政”。日本在经济安全领域摸索的“新道路”就是立足大国竞争，基于战略自主提升经济安全能力，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削弱对华“经济依赖”。这与日本在传统安全领域强化自身安全能力，对外与共享价值观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同时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自主不一样。前者的路径是在关键经济领域对华“脱钩”，后者的路径则是在关键安全领域对美“依附”，两者路径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战略自主的精神内核是奉行西方价值观而不是亚洲价值观。日本政府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对自身经济增长的期待，也体现了日本战略自主的国家主义底色。2022 年 1 月，岸田表示：“经济安全作为新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刻不容缓的课题。”^①

日本与美欧的接近和对华的疏远，是出于对进不了美欧市场的担忧以及对未来中国经济对日本重要性的不抱期待。日本深知中日在关键经济领域上的非对称性经济依赖还未达到严重程度，更何况日本还可凭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盟友为后盾。^② 日本对华局部“脱钩断链”的背后，体现的是其对中国经济技术变得强大进而威胁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担忧，其目的是构建新的经济关系以形成对华“封锁”和“规锁”，制造战略优势和竞争压力，扩大日本战略空间。日本尽管警惕中国可能会以经济为工具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但并不特别担心来自中国可能施加的“经济关系总量压力”，因为中日“经济总量”与“敏感性”和“脆弱性”等关键性指标不是必然的正比关系。

①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2022 - 11 - 15]。

② 中国对日出口商品的“不可替代性”较低，即使是特殊资源，日本也能从国际市场获得。在动态的经济联系中，日本对华形成的经济依赖短期影响大，长期看是可以被替代的，反倒是市场体量等硬性条件难以被替代。

日本甚至还有不少声音对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有“崩溃论”预测，主张对未来中日经济联系的“互相衰退”也有心理准备，消极看待中日经济合作与政治外交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日本有观点提出：“即使日中两国经济合作绝对值持续扩大，也很难加深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对中国而言，日本不会重新成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的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对日本而言，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与东盟相比也在降低”；由此认为，“未来日中经济关系发展未必对政治关系的稳定有贡献”。^①从长远看，日本更不想把“经济命门”交由中国掌握。岸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经济安全本质就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继续维持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而这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是体现在经济总量意义上的，而是经济和安全影响力层面的，包括在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及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关键方面。

尽管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愿景目标相对清晰，但当前中日经济联系密切仍是现实，日本还不想失去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时，日本也认为由于中国已经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华“经济封锁”政策也会伤及自身，如果“政治逻辑”发挥的作用过强，则有可能造成大的经济损失。^②因此，主张“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岸田政府即使面对国内强烈的对华强硬要求，仍试图在中美对立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于是，在愿景目标、经济现实、政治压力和外交平衡诸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岸田政府的经济安全战略表现出政策路线上更为偏美、实施手法上对华相对温和的矛盾性。日本企业也在政府政策之外基于经济逻辑提出构建双轨供应链，在欧美之外嵌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由于日本不能像“超级大国”美国一样同时追求价值理念与经济利益，因此其尽可能地在国际层面利用规则和制度对大国行为进行规范，努力突出日本的存在感和发挥经济影响力。一方面，日本引导美国回归TPP并警惕中国加入CPTPP，一再强调确保CPTPP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对维护经济安全非常重要。^③另一方面，日本又参加了中国主导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意图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这种国际经济安全上的矛盾行

① 関山健「経済相互依存と政治関係—日本と中国—国交正常化45年の変化と今後—」、<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8.html> [2022-11-07]。

② 白石重明「『経済安全保障』の本質的課題」、2022年3月8日、https://www.npi.or.jp/research/data/NPI_RN_20220308_shiraishi.pdf [2022-11-15]。

③ 外務省『令和4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 [2022-10-20]。

为与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有追求愿景但还囿于现实”的未成形的战略自主状态其实是一致的。2022 年 2 月，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表示，“经济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能以独立的方式做出决策，而不是被其他国家的举动所左右”，强调要强化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①

（二）大国竞争思维带来战略不足

从组织架构到法律制度，从政策方案到战略构建，从政府主导到民间参与，日本持续强化推进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但其在形成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因大国竞争思维产生了明显的不足。

一是与日本国家身份定位和应发挥的战略作用违背，反而会带来“战略消耗”。战后日本通过与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享受互惠，实现“独立、生存以及繁荣”，树立起引领自由贸易的“旗手”形象，并致力在大国之间实施“平衡外交”。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倡导对半导体产业提供政府补助金的系列做法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更降低了日本作为自由贸易“旗手”的国际形象。^②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偏美遏华倾向，未发挥出日本作为“中等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构筑中美共存国际体系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会削弱日本作为“特殊第三方”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平衡作用，还会因“选边美国”而加大战略负担，更会导致“摇摆国家”^③和地区国家对“拉偏架”的日本产生战略失望，甚至动摇其“印太战略”的区域支持基础。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所体现的意在对外施加影响的“战略不可或缺性”存在自身漏洞，因为一旦某个国家不依赖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凭借“战略不可或缺性”不仅不能减少威胁，甚至会让对方因感到敌意而采取更加激进的安全反应措施，进而加深安全战略困境。例如，朝鲜核导问题就不可能在日本的经济安全政策压力下得到缓解，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二是扩大的经济安全政策对日本自身经济活动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扩大，

① “Cabinet Approves Bill To Beef Up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2/02/25/business/economic-security-bill-cabinet/>[2022-10-20].

② 「半導体補助金 最善の選択か再考を」、『朝日新聞』2021 年 11 月 12 日。

③ 2012 年，美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丹尼尔·克利曼和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方丹提出“摇摆国家”概念。“摇摆国家”的特点是，作为民主国家的它们乐于支持现存体系中的开放、稳定和规则，但立场不稳定，会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参见：Daniel M. Kliman and Richard Fontaine, “Global Swing States Brazil, India, Indonesia, Turke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27, 2012, 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global-swing-states-brazil-india-indonesia-turkey-and-future-international-order[2022-11-15].

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衰退，甚至反噬经济安全战略追求的“战略自律性”。经济只有在开放交往中才有生命力，经济安全举措本身会消极影响经济发展和能力提升，还会阻碍财富和服务在国家之间的顺畅流动。^①日本严格管制采购和出口，会导致自身失去国际分工的利益；同时，这种干预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增大企业经营负担和风险，打击企业研发和生产积极性，并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活力。2022年3月，日本经团联和日本商工会会议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运用中减轻受管制企业的负担。对于事先审查制度，日本经济界表示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会在法律层面造成更多的“灰色地带”。此外，专利的非公开化制度也会产生减退研发热情、减少专利授权收入等副作用。而且，日本在经济安全上对美国的追随很可能造成自身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外部“依赖”，与其所追求的“战略不可或缺性”目标背离。

三是日本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追求所谓的价值观理念并不利于日本推动自由贸易的扩大，反倒容易在地区引发意识形态的对抗。日本将经济安全和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挂钩，会导致对外经济合作脱离经济安全本身，而被运作为在“经济方略”下制约对方的政治外交工具。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等国情各异，而日本的“经济价值观”等与地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并不一致，这些国家不愿意被卷入大国博弈中。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隐含的对华针对性也容易引发地区的警惕和排斥，迟滞区域经济一体化及进程，背离日本区域经济构建愿景。

五、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影响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国民安全结合起来，并在执政党推动和政府指导下迅速构建。在法律制定比较谨慎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从提出到国会审议通过并未遭到强烈反对，显然具有很强的支持基础。这表明经济安全战略及政策在日本已经成为跨党派共识，而不是某届政府的特色政策，必将长期开展并持续深化，未来日本国家战略与安全的互动将更加紧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基于“安全+政治”的复合逻辑构筑对外经济合作“壁垒”，加之明显的“去中国化”目标指向，必将在地区层面推

^① 日本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第197页。

动大国竞争走向“深水区”，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一) 助推大国竞争在地区层面开展博弈，阻碍亚太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深入，并导致亚太安全形势复杂化和严峻化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关注大国竞争，强调“政治逻辑”而非着眼单纯的“经济逻辑”。所谓“经济逻辑”，就是以市场原理为中心寻求经济效率的逻辑，是基于对市场功能的信赖。与此相对，“政治逻辑”追求与经济效率不同的政治价值、地缘战略和安全利益。日本经济同友会认为，在大国竞争鲜明深刻的情况下，世界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也无法回到自由贸易主义的全球化，以经济实力和尖端技术为武器构建新国际秩序的“非常时期”仍将持续，单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经营无法跨越“非常时期”，建议经营者有必要将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观点反映到经营战略上，并要求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保障局的经济安全体制。^① 日本还提出，为实现“印太战略”，在经济安全上“有必要主导东南亚、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地缘经济学竞争”。^②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介入和影响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且在政策路线执行上体现出“偏美”的一面。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日本并不是“中美竞争中的中立第三方”，“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竞争，日本都与美国保持相同的战略立场，成为大国竞争的当事方”。^③ 尽管日美在经济安全合作上也存在矛盾，但两国战略合作需求和共有利害胜过相互摩擦，愿意利用各自在地区经济干预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更广泛的安全合作，联手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日本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上强化对华出口控制和“脱钩断链”，支持美国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标准多边贸易协定“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助力美国对华筑造“小院高墙”，并利用自己在地区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和区域合作协定拉拢地区国家在大国竞争聚焦的“印太”地区辅助构建对华“包围圈”。同一报告还提出，“过度限于重视国际协调的自由主义，无法阻止侵略”，因为大国竞争有围绕数字革命后社会系统的竞争及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之争，甚至关系着设定“势力圈”。^④ 究其原因，“美国对亚洲

① 「『強靱な経済安保を』同友会提言」、『朝日新聞』2021年4月22日。

② 公益社団法人経済同友会「強靱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に向けて—地経学の時代に日本が取るべき針路とは—」、2021年4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2022-12-06]。

③ 高橋杉雄「日本—大国間競争の時代に求められる政治的選択—」、『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22』、<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pdf/eastasian2022/j08.pdf>[2022-10-20]。

④ 同上。

以及‘印太’干预的下降既有利于中国，也会导致日本在日中关系中的谈判能力下降”^①。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国，日本需要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能力，努力提高日美在“印太”经济领域的“共同主导力”，增强美国一侧的对华经济竞争优势，帮助美国维持领导地位，并通过日本的支持使美国“重视印太、遏制中国”的战略重心不发生动摇，进而提升自己在亚太的对华战略优势和强化对华战略压力。日本将经济安全作为开展亚太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发挥了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所期待的“力量倍增器”作用，在地区层面激化了大国博弈。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推行“友岸外包”，突出所谓“人权、开放和透明”等价值观，重视与可信任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合作建立稳定供应链，降低重要战略资源的地缘政治风险，在“高标准”“高规则”的经济标准下推动具有排他性的区域经济贸易体系，这与战后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对增长的正追求有较大差别。近年来，亚太经济一体化需求大幅增加，自由贸易接受度高，各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协作的内生性较强，形成了包括RCEP在内的多层次经济合作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向好。中国是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与亚太各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并对加入CPTPP持积极立场。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支持美国非互利的经济合作框架，刻意排挤中国加入CPTPP，对抗性明显，蓄意推动地区在关键经济领域形成少有交集甚至平行化的“两个集团”。日本这种“阵营化”做法无疑会造成地区经济的撕裂，破坏亚太各国在原本分散和粗放化发展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脆弱的互补性，不利于地区形成基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增长和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博弈色彩，必然会加剧地缘战略竞争与安全风险，造成地区安全形势出现新的紧张与不安。日本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半导体原材料上对韩国采取的限制举措，是导致彼此缺乏互信并造成地区安全形势复杂的重要原因，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分别加大了对美国和其他外部力量包括北约的安全投资和力量借用。日本利用大国竞争炒作下一场冲突的“燃爆点”——台海问题，并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安全挂钩，以所谓“台湾有事”为前提借稳定供应链之名行“挺独”之实，加大与中国台湾方面的“经济+安全”互动，政治化提升台湾地区在全球供

^① 公益社団法人経済同友会「強靱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に向けて—地経学の時代に日本が取るべき針路とは—」、2021年4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 [2022-12-06]。

供应链中的地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鼓噪，为日美介入“台湾有事”找借口、打铺垫，制造台海地区新的紧张局势。2021 年 8 月，自民党就与台湾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2+2”会谈，讨论强化双方经济安全合作，还表示欢迎台湾当局申请加入 CPTPP，其背后的战略目的就是借助经济合作之名实施“以台制华”。日本斥资力邀台积电赴日建厂的目的，是要掏空未来中国在中半导体领域的优势，提前谋划地缘竞争，这显然不利于亚太的和平与稳定。

（二）削弱中日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进而负面影响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在大国竞争中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自主的意图。对此，小林鹰之提出，中日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联系极度紧密，日本和中国“脱钩”十分不现实，日本应判断在哪些领域同中国合作。他强调有必要发展日本自己的战略，提出要战略性思考到底是牵制中国，还是重视维持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在中美间取得平衡。^①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一些较为理性的主张，认为日本完全追随美国有可能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对日本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建议应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在外交安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恶化，展示平衡感。然而，这些在大国竞争中基于国家利益“保持平衡”的主张，虽然存在于日本的对华经济战略中，却渐湮“沉默”。

在当前日本对华持总体强硬态度的政治氛围中，自民党和政府内部主张对华在关键领域实施“脱钩”以及在经济上与中国展开较量、进而迫使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屈服”的想法抬头。2021 年 10 月 3 日，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在电视节目中称，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战略性谋求对华“脱钩”。12 月，安倍晋三也表示，中国应正确认识与日本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即使日本已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出现障碍的话对中国也是巨大打击，强调让中国认识这一点对“抑止冒险很重要”。^②日本国内其他观点提出：“如果中国正确认识与日本的经济相互依存，也会尽量避免对日关系发生断绝和加剧对立。日本应该主张的事情要坚决主张，这样中国才能意识到断绝关系的风险。”^③这与日本经济安全战

① 「対中外交、牽制か融和か 経済安保の行方、試金石」、2021 年 10 月 19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080942.html> [2022 - 11 - 15]。

② 「台湾有事巡り、安倍元首相『軍事的冒険は経済的自殺への道』…中国をけん制」、2021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11201-OYT1T50217/> [2022 - 11 - 15]。

③ 関山健「経済相互依存と政治関係 一日本と中国—国交正常化 45 年の変化と今後—」、<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8.html> [2022 - 11 - 07]。

略偏向美国的行为相呼应。2022年2月19日，外务大臣林芳正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日本应基于与美国共享价值观，一道在台湾问题、AI、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反映了战后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正在出现变动迹象，从主张加大对华经济联系转变为强调对华经济在关键领域“脱钩断链”和所谓“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使得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和“助推器”的经济合作严重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干扰和安全逻辑影响。这必将破坏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也使未来中日在地区及第三方的经济合作前景堪忧。日本以“经济安全”名义打压中国企业，并资助在华生产的日企迁回国内，表明日本刻意减弱与中国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经济联系。虽然日企加入中国市场的意愿仍然高涨，但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进驻中国大陆地区的日企达12706家，在华日企数量创十年来新低，出现了“去中国化”动向，而且在华日企多属IT企业和制造业等非关键产业领域。^①

尽管有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但大国竞争下日本的“中国+1”战略更有削弱中国经济优势的政治和战略考虑。继吉田茂政府时期提出通过经济合作改变“共产主义中国”的战略设想之后，日本对华“经济方略”思想再起，路径却反向转变为与华在关键经济领域的“脱钩断链”。细谷雄一提出，“以经济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进而谋求本国利益的‘经济方略’手法变得重要”，“在此基础上要谋求与中国的‘选择性脱钩’，一方面严格限制有助于中国强化军力的最尖端技术出口，另一方面要在民生技术领域构建让中国不得不依赖日本的关系，增加中国对于日本的脆弱性”。^②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有利用大国竞争影响中国崛起之经济环境的战略意图，其重点落在减少对华经济联系存量，甚至是在关键经济合作领域“去存量”，同时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经济增量，包括在关键领域的战略增量。这与日本基于价值观在“印太战略”下对华实施“软制衡”形成了配合，也必将与“印太战略”产生联动，在脱离中国经济“牵制”下助力日本对华开展政治交涉和安全博弈，为日本想要的“大国地位”谋取战略条件。

^① 「日本企業の『中国進出』動向調査（2022年）」、2022年7月、<https://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220705.html> [2022-10-20]。

^② 細谷雄一「日中国交50年 狭まる日本の自律性」、2022年8月29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829-7HBTCP4ZJJ7BC6PXWP4UMH6OY/> [2022-11-07]。

从长远视角看，日本在完成对华“选择性脱钩”后，会更轻率地采取对抗和冲突的方式解决两国矛盾和争端问题。这种在“低门槛”和“低成本”的战略评估下做出的行为将对中日关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大国竞争叙事下，美国利用盟友体系等优势对华实施集体遏制，聚集经济领域实施战略打压，提出“安全”“公平”“繁荣”等经济竞争理念，诋毁和挑战中国提出的全球倡议，限制中国在“印太”的增长潜力，谋求霸权护持。受大国竞争战略影响的并不只有中国，更包括与中美均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亚太，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却在竞争意识下将“安全逻辑”乃至更广泛的“政治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既不能将中国完全排除在外，还会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会伤及追求自由和开放的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恰当地平衡“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对日本维护国家利益也十分重要。经济一体化发展和新老矛盾交织的地区更需要加大域内的经济联系，“低政治领域与高政治领域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赋予相互依存更大的能动性，为避免冲突或降低冲突的程度提供了更大空间”。^① 2022 年 1 月，岸田称中国在经济和安全层面正成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强调必须贯彻现实主义去判断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岸田的“中国重要说”是侧重负面的冲突性影响还是正面的合作性收益，以及未来日本该如何选择，都考验着岸田政府的战略智慧。在国际变局下，日本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恰当的正向积极的战略作用，促进大国合作并推动国际体系稳定。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过程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和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不自信，表明中日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互信严重缺失。日本应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继续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坚持亚洲国家身份，与中国一道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并在其中发挥积极和正向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璇夏)

^① 张宇燕、徐秀军：《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45 页。

Abstracts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Postwar Era

Oyane Satoshi

The “Yoshida doctrine” is the origin of 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From the end of WWII to the 1960s, Japan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the Japan – U. S. alliance. In addition, Japan also participated bilateral alliances and the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system. Those systems build the decisive framework for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while playing an important complementary role i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80s, Japan relied on Japan – U. S. relations to implement self – control measures to cope with four economic crises and provided ODA to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and gain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throug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summits, GATT, and APEC. From the 1990s to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Japan explored beyond traditional economic diplomacy by sup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rotec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Japan relied o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nd norms to alleviate errors and conflicts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Besides, Japan hoped to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Since 2010,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declining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powerful emerging economies, Japan has strengthened its dependence on the Japan – U. S. all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ining China and joine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economic security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economic diplomacy is not only consistent but also shows unexpected changes.

Great Powers Compet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Meng Xiaoxu

In the context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Japan is strategic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asymmetric dependence of economy”, which violates economic laws. Therefore, Japan focuses on security and political logic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and seeks “strategic self – discipline”, “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 and “strategic dominance”. Internally, Japan actively improves its strategic system, strengthens strategic management, enhances security capabilities and strengthens strategic sup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Japan based its strategy on democratic values with the guidance of “realism – based diplomacy”, pursuing policies of “decoupling and chain breaking” in key areas with China and “friendly shoring” with Japan – U. S. cooperation as

the foundation. Japan seeks to integrate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c systems and market rules, expanding economic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democratic partners” and reshaping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order.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s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economic security under the “strategic independency” and pursue the self – discipline, indispensability, and superiority of Japan’s economy. However, it has obvious strategic defects and contains stro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strategic game intention, which will also lead to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posing more complex and severe challenge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China – Japan relations, which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New Trends, Motivations and Impact of Japan’s Policy towards Taiwan: From Economic Security Perspective

Zhou Shengsheng

With the great power game caused by the upheaval of new international power pattern and the impact of COVID – 19 on the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Japan to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and compete for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process, it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Japan’s moves to strengthen its economic security guarantee involving Taiwan. On the one hand, Japan’s policy towards Taiwan focuses on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ndustry with semiconductor as the core, in an attempt to ensure Japa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is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also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Taiwan region in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center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shared values” and cooperate with the containment strategy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gainst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Taiwan issue not only concerns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but also bears on the complet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Japan’s reckless actions on the Taiwan issue not only seriously interfere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a – Japan rela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impose an adverse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tide of cross – Straits reunification. However, the trend of cross – straits relations has been firmly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benefit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s Taiwan will be extremely limited.

The Impact of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on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Cui Jian and Li Shiyue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 has enhanced the positioning of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 use technology,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positioning of university research.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promote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changes on university research in military security guarantee research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That upgrading of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related policy changes